



G20 治理对全球经济失衡演变的影响研究

刘 威 李同稳 王 钊

摘要: 2005年以来G20加强了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不仅明确提出主要成员方治理自身失衡的建议,而且及时将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G20首脑峰会议题,初步达成全球经济失衡的评估指标体系。从其治理对贸易、金融、资源、财政和增长等领域失衡的影响看,虽然使2006—2008年和2010—2011年的失衡改善,但在G20机制化建设不足、全球失衡治理与世界经济复苏存在矛盾、G20未重视全球结构性失衡调整、G20对失衡治理标准未达成一致及未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影响下,G20治理并未根本改变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 G20 治理; 全球经济失衡; 影响评估; 制约因素

20国集团(G20)1999年在德国柏林成立,目前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需求推动下,G20已逐步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协调最主要的非正式对话平台,对全球经济失衡治理产生重要影响。那么,G20对全球经济失衡治理的影响有多大,其实际功效如何,影响其治理失衡功效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当前G20框架下的全球经济失衡治理,为G20全球协调有利于中国,提供有效的参考。

一、G20 在全球经济失衡及治理上的主要进展

G20建立的初衷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及其G8盟友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挑战,将加速上升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联合起来,置于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机制下的全球核心政府管理体系中”(John Kirton,2005),并通过G20这一对话平台,进行全球经济治理。在最初的G20全球治理框架下,各国间对话仅局限于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平台,其议题主要围绕全球经济发展。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G20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并行的一种机制。从2008年11月的G20华盛顿首脑峰会至今,其先后举行了多次会议,这些会议推动了G20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

(一) 明确提出主要成员方治理自身经济失衡的建议举措

根据G20历次会议公告,可以发现G20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5年,已经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在2005年10月的G20北京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G20明确提出“加强全球合作;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这次会议虽然主要关注各国的平衡发展,包括如何强化发展融资合作和发展理念创新,但却首次明确提出“高价波动的石油价格、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膨胀的保护主义情绪等风险在蔓延,这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对此,G20明确提出“决心实施必要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快结

构调整,以期解决失衡问题,化解风险”^①。到了2007年南非开普敦G20会议,G20为了确保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如何应对失衡,提出“美国应采取措施提高本国储蓄水平,欧盟应进一步通过改革加快发展,日本应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和巩固财政,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要通过改革刺激内需,而产油国应注重宏观经济的稳定”等^②。

(二) 及时提出将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首脑峰会的主要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G20为了更好的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协调,将G20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但是,为了使全球经济迅速从危机中复苏,在2008年的首届G20华盛顿首脑峰会和2009年的G20英国伦敦峰会上,各国并未关注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而更为关注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及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随着2009年末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及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逐步消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G20匹兹堡首脑峰会上,首次将确保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G20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提出G20应建立“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新经济框架”,这得到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国家在内的各方的明确赞同,“全球经济再平衡”也成为此次峰会的首要任务。

(三) 初步达成全球经济失衡的评估指标协议

2010年及2011年的G20首脑峰会和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都相当重视全球经济失衡治理问题,并开始了全球经济失衡治理的制度化进程。2010年10月G20首尔峰会确定由G20财长会议负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参考性指南”的设计,在2011年2月的G20巴黎会议上,各成员方就全球经济失衡的评估指标达成了初步协议,提出界定各国经济失衡及其治理成功与否的指标体系:第一,确定将公共债务、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等指标,作为界定一国内部经济失衡的主要指标;第二,确定将贸易账户、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等指标,作为界定一国外部经济失衡的指标,并适当考虑用汇率、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性指标,衡量一国经济失衡。在该体系中,对中国、印度、巴西等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国家不利的国际储备指标和汇率指标没有被列入。此后,经过各方的再次协调,2011年4月的G20华盛顿财长会议,同意采用IMF提出的失衡度量方法,并就失衡的参考性指南量化方案各方达成了一致(黄薇、韩剑,2012)。尽管目前的G20测度方法并不十分完善,但这是第一次由G20各成员方首脑认可一致的系统化识别方法。2011年11月的戛纳首脑峰会明确肯定了这一失衡评估的参考性指南协议,使其开始使用于各成员方经济失衡的实际评估。

然而,随着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虽然G20仍将“各国间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视为其首要任务,但在全球经济失衡治理上进展减缓,开始更为关注如何激活全球经济的重新增长。

二、G20治理对全球经济失衡演变的影响评估

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美国与东亚经济体及石油输出国间的贸易失衡;二是世界主要国家间的资本和金融领域的发展失衡。本文重点利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物贸易失衡、资本流入失衡等指标(Alan Ahearne, J Von, 2006),并试图从资源、财政、经济增长等领域的失衡治理成效,及比较G20与三大经济组织的失衡治理效果,全面评估2005年前后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G20治理对全球经济失衡演变的影响。

(一) G20治理对全球货物贸易失衡影响的评估

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Rato发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研究报告,正式将全球经济失衡界定为:美国拥有大量的贸易赤字,而与其贸易赤字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日本、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在2008年之前,西方经济学界基本认同这一观点(Vincenzo Quadrini, 2006)。因此,从全球经济失衡的外在表现看,美国与其他经济体间的贸易失衡是否发生改变,是全球经济失衡治理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利用美国商务部的货物贸易失衡统计数据,分

①《第七届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公报》,http://finance.sina.com.cn/j/20051016/17052036748.shtml.

②《第九届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1/19/content_7101789.htm.

析在 G20 关注全球经济失衡后,美国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间的货物贸易失衡演变。

从下图 1 看,2002—2011 年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美中、美日及美亚贸易逆差的演变,明显呈现先递增,再递减,进而再递增的发展趋势,而在这一趋势中,2006 年和 2009 年是两个明显的分界点,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为例,2002—2006 年,美国对外整体贸易逆差从 4682.6 亿美元增加到 8279.7 亿美元,但 2006—2009 年,随着 G20 开始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日益关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 8279.7 亿美元逐年减少到 2008 年的 8162 亿美元,2009 年则进一步剧减到 5035.8 亿美元。但是,随着 2008 年 G20 将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解决,将关注重点集中到自身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再平衡一度被忽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重新逐年递增,从 2009 年的 5035.8 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7273.9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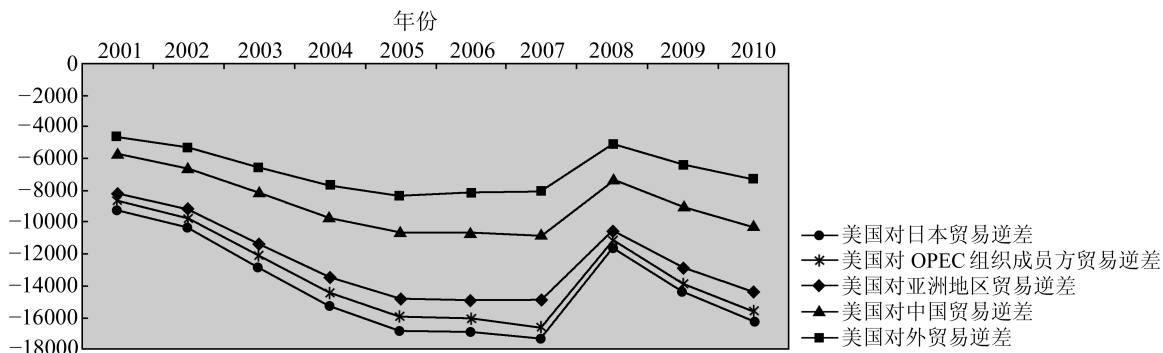


图 1 2002—2011 年美国对外货物贸易失衡演变 (亿美元)

资料来源: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tse.export.gov/TSE/ChartDisplay.aspx>。 本文根据作者搜集的数据描绘而成。

与此同时,2005—2007 年美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虽然仍持续增加,但其年增速从 2005 年的 16.6% 下降到 2007 年的 1.2%;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速从 2005 年的 24.7% 下降到 10.4%; 美国对 OPEC 的贸易逆差增速也从 2005 年的 36.2% 下降到 6.6%。虽然 2008 年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又开始逐步增加,但对比 2010—2011 年和 2009—2010 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增长看,无论是贸易失衡数额的绝对增长,还是其年增长率,都在逐步减缓,如美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绝对增长额就从 2009—2010 年的 605.3 亿美元减少到 2010—2011 年的 330.7 亿美元,年增长率从 18.8% 减少到 8.6%; 同期美国对 OPEC 贸易逆差绝对增长额从 2009—2010 年的 338.5 亿美元减少到 2010—2011 年的 312.8 亿美元,年增长率从 54.8% 减少到 32.7%。

由此可以看出,2005 年后 G20 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关注,使美国和亚洲经济体及产油国的贸易失衡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G20 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还是起到一定效果的,但从 2008 年后全球经济失衡的演变看,这种对失衡的治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贸易失衡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与 G20 的全球经济治理各个时间段的关注重点及其对美国经济周期的影响有一定关系。G20 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关注目标上的不一致,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功效,使其难以根本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扩大趋势。

(二) G20 治理对美国与其他国家间金融失衡的影响评估

自 2005 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特征逐步被揭示,以及对“资本双向流动”问题研究的深入(Miranda Xafa, 2007), Caballero 等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世界主要国家间的金融市场发展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关系(Ricardo J. Caballero, Farhi E. Gourinchas O., 2006),更多学者认识到:在美国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间出现经常项目失衡的同时,各国在美国安全和高竞争力的金融市场的吸引下,对美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净流入,从而支撑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扩大,也形成了美国与中国等贸易顺差方之间的基于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业——制造业国际分工。

从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视角分析,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扩大需要外国对美国资本的净流入来支撑,这也意味着当美国对外贸易出现失衡时,外国和美国间的资本流出入也将有失衡趋势。由表 1 看,2002—2005 年外国在美国资本拥有额与美国在外国的资本拥有额之差从 5005 亿美元增加到 7008 亿美元,其

中 2005 年比 2004 年增加 1685 亿美元, 年增长率高达 31.7%, 但随着 2005 年 G20 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重点关注, 2006 年这一资本差额仅增长 787 亿美元, 年增长率仅为 11%, 增长率下降近 20 个百分点。2007 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进一步作用下, 这一差额又减少了 1685 亿美元, 下降到 6110 亿美元。与此同时, 2005 年外国购买的美国政府债券总值比 2004 年减少了 1016 亿美元, 降低了 32%, 2009—2011 年, 在 G20 再次关注全球经济再平衡时, 外国购买的美国政府债券总值从 4373 亿美元进一步减少到 2188 亿美元, 下降额度高达 50%^①。

表 1 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资本流出入统计(亿美元)

项 目 \ 年 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外国在美国拥有资本额	7952	8583	15332	12474	20652	20646	4314	3044	13083	10010
美国在外国拥有资本额	-2947	-3254	-10009	-5466	-12857	-14536	3321	-1195	-9395	-4837
外国拥有的美国政府债券额	910	2249	3149	2133	4284	2699	5914	4373	3533	2188

资料来源: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 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June 13, 2012.

因此, 2005—2011 年间, 虽然美国次贷危机等经济周期因素, 对外国对美资本流入产生不利影响, 但美国资本流出入的趋势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变化大致趋同。首先, 自 2005 年 G20 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治理, G20 先后在 2006 年墨西哥央行和财长会议及 2007 年开普敦央行和财长会议, 关注矿产能源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及各国应对失衡的具体举措, 此时全球贸易失衡开始缓解, 亚洲新兴经济体等的贸易顺差也随之有所减少, 其对美国的资本流入也开始减少或增速减缓, 全球资本流动失衡得以缓解。

其次, G20 对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的关注的演变, 也影响了全球金融失衡的治理效果。2008—2009 年 G20 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开始关注全球经济自危机中恢复增长, 其中伦敦峰会提出了一项 1.1 万亿美元的经济扶持计划, 但对全球经济失衡及治理未重点关注。因此, 美国经济恢复带来的进口增长, 使外国购买的美国政府债券开始增加, 全球贸易失衡重新恶化。而 2009 年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重新恢复, G20 开始重新关注全球经济失衡治理, 2009 年的 G20 匹兹堡会议明确将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首脑峰会主要议题, 美国资本净流入和对外贸易逆差的变化又日益趋同, 逐步减少。但是,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 各国更为关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G20 的全球治理成功使美国经济摆脱了金融危机, 恢复了其进口能力和金融影响力, 使其资本项目下的净流入向持续扩大发展。

(三) G20 对其他经济领域失衡的影响评估

虽然此次失衡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和金融失衡, 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 其影响进一步外延至全球资源拥有和财富失衡、全球财政收支失衡, 乃至全球增长失衡。而 G20 作为 IMF 和 WB 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补充, 在这些领域也做出了有效治理。首先, G20 明确制订措施控制石油价格, 防止全球财富失衡加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国际能源价格持续攀升, 使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 G20 从 2006 年的墨尔本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就开始重点关注全球能源与矿产失衡的应对, 2011 年 G20 嘎纳会议进一步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控制, 2012 年 G20 墨西哥首脑峰会明确提出对石油价格的变化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 包括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产油国实现自己承诺, 随时准备动用备用产能, 维持与需求相当的全球供应。在其影响下, 美国与 OPEC 国家间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贸易逆差增长率从年均 24.3% (2005—2008) 下降到 22.2% (2009—2012), 尤其是 2009—2012 年, 其年增长率从 36% 减少到 -5.1%, 2012 年其逆差绝对值甚至比 2011 年减少 87.71 亿美元^②。其次, 金融危机使欧美各国财政赤字日益扩大, 相继出现美国财政悬崖和欧洲债务危机, 而 G20 也从 2010 年多伦多峰会关注削减财政赤字, 将财政赤字纳入衡量各国失衡调整的指标体系,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承诺 2013 年前将政府财政赤字

① 传统理论提出: 中国、日本等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的巨额外汇储备, 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 又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 使美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净流入。

②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 虽然 2008—2009 年美国 and OPEC 间贸易逆差从 2066.32 亿美元减少到 996.65 亿美元, 但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对外石油进口能力降低导致的, 难以将其与 G20 全球失衡治理的影响完全分开。

削减至少一半,并在 2016 年前稳定本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间的比例。最后,自 2009 年 G20 将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作为其首要任务以来,美国等相继恢复经济增长(见表 2),虽然金融危机使 G20 平衡各方经济增长增速的作用难以显现,但其促使各方恢复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初步显现。

(四) G20 与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在失衡治理上的影响比较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全球经济协调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虽然 G20 的建立最初是作为 IMF 和 WB 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补充,但与之相比,G20 在全球经济失衡治理上取得了更大成效:其一,强调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更大程度参与全球失衡治理,使 G20 更易推进实际治理进程。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下,IMF、WB 和 G20 都强化了对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和失衡治理的关注。但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 IMF 和 WB 框架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以东亚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贸易失衡调整的意愿并不同。从 2009 年以来,G20 通过强化发展中国家在 G20 中的作用和平等话语权,实质性推进了全球经济失衡治理:G20 通过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 IMF 的投票权等,使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全球经济失衡衡量指标体系、改革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等问题上,更愿意和发达国家取得一致,从而推进全球经济失衡治理进程。

其二,G20 集中了三大组织中与全球经济失衡治理有关的主要成员方,且注意集中设置较少的议题,因此其经济协调相对更易成功。与三大组织相比,G20 成员方更少,且集中了中国、美国、东亚经济体等与失衡有关的主要当事方,其在失衡治理上更易协调一致,进而利用其在三大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将 G20 的政策需求扩大至 IMF 和 WB,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同时,G20 每次峰会的主题比 WTO、IMF 和 WB 年会的议题更少、更集中,如 2012 年在墨西哥举行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上,G20 仅制订了四大议题: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应该增资;以及全球贸易不平衡。较少的议题使各方在失衡治理上更易达成一致:在这次峰会上,G20 将失衡治理对象从东亚经济体扩大到石油输出国,使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产油国承诺在石油价格和供给调整,及全球石油贸易失衡治理上承担更大责任。

其三,G20 有效弥补了三大组织在失衡治理上的不足,将贸易、金融、增长等领域的失衡调整加以兼顾。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 强化了对全球经济失衡和恢复平衡增长的关注。而三大组织则由于自身功能限制,在失衡治理上起的作用相对偏小:IMF 主要通过加强汇率评估和债务减免,实现全球金融和财政稳定,强调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世界银行主要关注帮助最脆弱群体,并力求保持私营部门主导增长的潜力;WTO 则强调对金融危机后各国可能出现的贸易保护进行监督。因此,他们更关注金融危机的缓解、稳定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恢复,而对全球经济失衡治理和平衡性增长缺乏关注。G20 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从 2009 年开始就一直将全球经济失衡评估、治理和经济的平衡增长,作为主要议题,并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评估体系、控制经常项目赤字规模、实现全球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等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三、制约 G20 全球经济失衡治理功效的主要因素

从 G20 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关注及全球贸易失衡变化的趋势对比看,当 G20 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治理时,全球贸易失衡确有一定的减少或增长趋缓;当其重点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减少对失衡的关注时,全球贸易失衡又开始扩大。因此,G20 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是产生了效用的,未来美国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体可以在 G20 框架下加强合作,调整失衡。但是,也需认识到目前的 G20 还不能实质性扭转全球经济失衡扩大的趋势。综合来看,目前影响 G20 治理全球经济失衡功效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 G20 自身机制化建设的“天然”不足

G20 难以根本改变失衡扩大的趋势,与各成员方未被强制性履行 G20 峰会公告治理本方失衡有关,其深层次原因是 G20 自身机制化建设不足。G20 从建立之初就被视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间的非正式对话机制”(陈素权,2009)。因此,其主要凭借其成员方在 IMF 和世界银行中的重要影响力,控制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但是,G20 毕竟不是正式的国际机构,缺乏严谨的制

度安排和政策约束;同时,目前 G20 由以美国为首的 G7 发达国家集团主导,其成员方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间的利益分歧十分明显,而 G20 对其并没有建立各方认同的监督履行峰会承诺的强制性机制^①,这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并不需要严格按照 G20 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建议,调整自身内外失衡,从而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效果。尤其是目前 G20 提出的失衡评估参考方案的实践,仍主要依赖于各成员方的自我约束和评估,超国家层次的监督力量还未真正形成。因此,当前 G20 需要在如何强化其强制成员方履行承诺方面,深化相关制度安排,建立强有力的超国家监督和约束机制,使其成员方能更好的执行峰会承诺和最终决议。

(二) G20 全球经济失衡治理与世界经济复苏间存在矛盾

2005 年后在 G20 关注全球经济失衡及其治理的同时,美欧等国也爆发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使发达国家在关注全球经济失衡的同时,更强调自身经济的复苏。而从 2005—2011 年全球经济失衡演变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变化对比,二者难以共存。由表 2 看,2005—2007 年及 2010—2011 年,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减少的同时,美国 GDP 增长率却出现下降;同期,中国及东亚经济体却持续高速增长,而在失衡治理和本国经济增长之间,美国显然会更为关注自身经济的重新复苏,这就间接影响了 G20 的失衡治理功效。因此,当前 G20 在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时,需协调好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和治理全球经济失衡间的关系(Thomas Fues, Peter Wolff, 2010),重点针对二者如何协调,展开成员方的对话,最终找到失衡治理与促进各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点。

表 2 2002—2011 年主要经济体 GDP 增长率的变化(%)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国	1.81	2.56	3.46	3.05	2.62	1.89	-0.38	-3.52	2.99	1.68
中国	9.1	10	10.1	11.3	12.7	14.2	9.6	9.2	10.4	9.24
东亚	7.74	7.08	8.27	8.63	9.95	11.02	6.92	5.93	9.53	7.66

资料来源:Unctad stat report, <http://unctadstat.unctad.org/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三) G20 未重视全球“结构性”经济失衡的调整

目前, G20 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时更多强调多边合作,认为各方均有义务共同参与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在具体主张上,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扩大内需,而美国应增加国内储蓄,参与失衡调整。但是,这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实质:即当前的失衡是建立在全球制造业产品内国际分工,以及发达国家金融业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全球结构性失衡。因此,调整失衡应从如何调整现有的全球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金融结构入手,但如何调整现有的全球经济结构,并未成为 G20 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议题,这使得全球经济失衡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调整。中国在参与 G20 框架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时,应主动强调全球的结构调整,使各方能真正意义改善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

(四) G20 对全球经济失衡治理评估指标的标准未达成一致

虽然 2011 年 G20 巴黎会议明确提出评估一国经济失衡的具体指标,并在随后的财长会议上确定了度量失衡的具体方法,在全球经济失衡治理上取得了标志性进展。但是,此后各方就失衡治理中的各个指标的具体评估标准并未讨论并形成一致,如美国和中国就对一国经常账户逆差占 GDP 的比重上限应为 4% 还是 5%,存在巨大争议。这种争议使失衡各方在治理中难以有明确目标,最终也使得 G20 缺乏明确的数量标准作为参考比较的对象,评估各方承诺治理自身失衡的实现情况,其治理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也使 G20 难以发挥超国家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因此,未来 G20 需要在已达成协议的失衡评估指标上做进一步协调,确定具体的评估指导标准。

(五) G20 未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

2010 年 G20 首尔首脑峰会发表宣言,支持全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

^①虽然美国在 G20 匹兹堡峰会上提出并启动“各国相互协调和评价”机制,赋予 G20 成员方在 IMF 帮助下评估其他成员方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果,但其缺乏制度约束,不具备强制性。

体更多的“投票权”。随后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进入 IMF 十大持有份额股东行列。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在 IMF 中的“一票否决权”,美国仍然是 IMF 的绝对主导者(王国兴、成靖,2010)。与此同时,美元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国际货币多元化格局并未真正形成。这使得美国不仅仍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其国内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助其吸引大量外来资本;而且,其仍可使用国际主要本位货币——美元,持续进口国外商品,成为全球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最终导致美国对外经济失衡持续存在,也使得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趋势难以发生根本扭转。因此,调整全球经济失衡需要 G20 逐步探讨如何实现世界经济中心的多元化,尤其是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减弱全球经济对美国的货币和进口的依赖,最终使全球经济失衡真正得以缓解和改善。

参考文献:

- [1] 陈素权(2009). 二十国集团在全球金融与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4.
- [2] 黄薇、韩剑(2012). G20 参考性指南: 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一步. 金融评论, 1.
- [3] 王国兴、成靖(2010). G20 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国际展望, 3.
- [4] Alan Ahearne, J Von(2006).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 欧洲的观点. 国际经济评论年, 5.
- [5] John Kirton, From G7 to G20(2005). Capacity, Leadership and Normative Diffusion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Paper prepared for a panel on “Expanding Capacity and Leadership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From G7 to G20,”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1-5.
- [6] Miranda Xafa(2007). Global Imbalance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 29.
- [7] Ricardo J. Caballero, Farhi E. Gourinchas O(2006).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lobal Imbalances and Low Interest rates. *NBER working paper* 11996.
- [8] Thomas Fues, Peter Wolff, “G20 and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of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June, 2010.
- [9] Vincenzo Quadrini(2006). Capital Markets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 Imbalanc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EFR and NBER working paper*, 2.

Study on the Effect from G20's Adjustment on Global Imbalance

Liu Wei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i Tongwen (Graduate, Wuhan University)

Wang Zhao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2005, the G20 has improved the governance of the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the key members have explicitly put forward their own proposals of governing imbalance, and timely taken the global economy rebalancing as a G20 summit agenda, preliminary reached a agreement on the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cerned about its governance on trade, finance, resources, finance and growth areas, although the 2006—2008 and 2010—2011 global imbalance had been improved,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building, the constraction between global imbalance governance and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the G20 underrate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adjusting and absolute predominance in world economy, G20 failed to prevent the deterioration of global economy imbalance.

Key words: G20 governing; global economy imbalance governing; impact evaluation; constraints

■ 作者简介: 刘 威,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湖北 武汉 430072。

Email: liuweiac9055@163.com

李同稳,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硕士生。

王 钊,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生。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 2012 年度一般项目(12BJY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2011 年一般项目(11YJA79008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1 年度重大攻关项目(11&·ZD008)

■ 责任编辑: 刘金波